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之声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提升四大能力

□ 赵昌文 宋崇峰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而且还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增加了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难度。总的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我们全方位工作和体系化能力建设情况的一次检视。应该说,我国产业体系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了较好的动员、统筹和突击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深刻分析并加以认真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从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出发,总结吸取疫情防控中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四大能力建设。

第一,提升在日常状态和应急状态之间“顺畅双向切换”的能力。

各类严峻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是我们当下面临的现实环境。在有效应对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时,需要快速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提供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的产业体系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支撑,但总的来看,现有产业体系的“冷启动”能力依然有待加强,突出表现为初期应急预案对困难严重程度估计不够且操作性不强等。同时,在应急状态结束后快速恢复到正常状态也需要体系化能力的支撑,这种能力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在应急状态时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多不足。

还要看到,即使是在日常状态下,提升更好适应“极值”情况的能力也是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也需要在“顺畅切换”上下功夫。比如,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近年来“双11”购物成了新时尚,2011年至2019年仅天猫平台一家的销售额就从33.6亿元增长到2864亿元。这个数字的激增,不仅反

映出消费形态的快速变化,更给企业生产组织和营销方式、物流配送体系、金融支持手段、政府监管方式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重大改变甚至挑战。在这些方面,我国的产业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在日常状态和应急状态之间“顺畅双向切换”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而言会越来越重要。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明晰应急状态下各方的权责边界,细化应急征用及补偿等实施细则,以更高的法治化水平来最大限度提高应急响应速度,这同时也利于提高事后恢复到日常状态的速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预案精细化设计制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对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紧急状态事先准备好相应的一揽子政策储备。此外,还要分类完善重要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有效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形成多层次、多主体的储备体系。

第二,提升实现新产业新业态与传统产业之间“平稳衔接”的能力。

传统产业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转换是必然趋势,同时也会带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从工业发展史来看,当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处理好这些社会变革挑战比处理好技术变革挑战通常要更为困难,因此也更为重要。

在此次疫情中,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客观上加快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的速度。从机遇看,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应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线消费等一批远程非接触式的经济活动得到了宝贵的试错机会和发展空间,“零工经济”等就业形

态也得到了更多认可。这正是我国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的,也坚定了我们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机遇的信心。与此同时,挑战也相伴而生,比如,一些传统行业中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遭遇困难并由此引发就业等问题;存在数字治理体系建设跟不上、亟需界定和规范新的劳动关系等问题。能否处理好挑战、抓住机遇,都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传统产业向新产业新业态的转换是无穷尽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有能力强且尽可能平滑地实现这个过程。为此,首先要集中力量落实好“六稳”相关政策,尤其要把“稳就业”放在优先位置,稳固经济长期发展基础。其次,要继续加大对企业研发、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力度,增强企业竞争力,此外,还要顺势而为抓紧研究制定涵盖公平竞争、劳动就业、版权保护、算法公平等在内的数字治理规范及体系,确保新产业新业态尽快进入法治化轨道,同时也为处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者提供必要和合理的保护。

第三,提升充分调动和有效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积极性的能力。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疫情期间,很多国有企业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全力抗击疫情,有序复工复产,为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贡献重要力量;不少民营企业在捐款捐物、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抗击疫情、组织复工复产、稳定国内产业链等方面积极作为;一些在华外资企业也为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充分调动和有效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充分调动和有效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积极性

和创造性,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更是一种重要的实践能力。为此,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营造良好环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稳定民营企业发展预期;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更好保护在华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努力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第四,提升国内外生产力布局协同发展的能力。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既要解决好生产力的国内区域布局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谋划好生产力的全球布局问题。我国已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但从提高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发展更加稳定经贸关系、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个维度看,我国在推动国内外生产力布局协同发展方面还有一些不足,综合统筹国内外生产力布局是我们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看到的是,此次疫情也凸显了强化海外资源和能力布局的必要性,统筹国内外生产力布局需要在两个市场同时发力。为此,建议在持续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外资和高端人才的同时,推动国内企业有方向、有节奏地走出去,同时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断提升海外支持、服务、保障的全方位能力,最终实现国内外生产力布局的相互支撑、协同发展,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学术经纬

□ 刘孝成 罗琦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支撑就业、稳定增长、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逐步有所缓解,但是对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许多重要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中小企业投融资方面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随后,《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不久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研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些都为我们多方发力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应该说,打造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亦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强调“高度适应性”,要求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围绕中小企业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小企业的差异化、细碎化、高频化、快速化的融资需求;强调富有“竞争力”,要求各类金融服务提供者围绕中小企业融资产品和服务展开充分竞争,在更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展现软硬实力;强调具有“普惠性”,则要求丰富和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数量占企业主体90%以上的中小企业提供好融资服务。

分析起来,当前相关融资体系在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一些金融机构受传统信贷模式制约较多,相关信贷评判标尺并未跟上中小企业发展的节奏,尚未从根本上满足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二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质化较重,缺乏软硬结合的竞争力。三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肠梗阻”,相关政策未能真正惠及企业。应该说,近年来部分地区先行先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提高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政府、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三方必须持续协同发力,通过疏堵并举、标本兼治,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一方面,可考虑顺应中小企业发展新需求,突破传统信贷模式。金融机构应探索能够跟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日益变化的办法,立足评估更加透明、贷款更加简化、放款更加快捷、还款更加灵活的要求,通过做好风险把控、挖掘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开拓未来金融市场空间等多重目标的平衡,创新质押信贷模式,使中小企业融资更简洁、更易操作,更具商业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推出精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一是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开发适合中小企业个性化的金融产品,着力降低贷款难度和成本,提高贷款总量,实现信贷资源的精准投放。二是着力改变信贷业务重产品、轻服务的状况。借助各种手段宣传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相关服务流程和注意事项等,详细阐述面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全流程服务方案,进一步优化在线评估、贷款、还款等操作流程和页面互动功能,使中小企业做到明明白白、心中有数。

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全力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还要强力推进政银企合作。就政府而言,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有效联合各方力量,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细化实施方案,推广各地有效的典型经验和模式;另一方面要搭建跨部门多层次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孤岛,更好服务于各类金融机构。同时,还要实施分区区域分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差异化监管考核机制,推进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就金融机构而言,要充分利用政府数据共享平台,借助专家库、信息库等多维数据,深刻了解中小企业的产品、技术等,全面、精准刻画中小企业信用及经营状况,从而精准对接银企双方现实需求,为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就中小企业而言,要着力提升自身信息透明度,充分展示产品、技术等等信息,提升自身短板,增加自身信用度,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总之,要通过政银企三方有效对接、良性互动,打通中小企业融资的神经末梢,为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多方发力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理论在线

强化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支持力度

□ 曾路遥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驱动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的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成果转化存在数量少、规模小、效率低等问题。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要发挥好政府作用,特别是要增强财税政策的支持和激励作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和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完善资金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财政贴息、信用担保和多元投融资体系,从而营造能充分调动创新主体驱动力的发展环境,实现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提高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第一,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扶持力度。财政投入是大多数科技创新活动的启动器。目前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欧

盟15国平均水平,但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强化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关键要完善投入机制,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一是保持和增强R&D经费投入的强度,从源头上增强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二是完善现行财政补贴制度和政策,进一步明确财政扶持方向;三是优化财政在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个不同阶段的投入比例,合理规划不同阶段的支出规模,提高基础研究的地位,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重要动力;四是优化财政在不同区域的投入配置差异,适当强化对中西部地区的财税政策倾斜和人才引进政策支持,以缓解区域间财政资源、科技资源配置的供需矛盾。

第二,完善财政科技资金监督管理机制。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需要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科技资金监管机制,建议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行阶段性考核验收,规范项目验收程序,实行较为统一的项目验收标准,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量化指标评价体系。要实行综合监管,建立无缝衔接的责任链和联合惩戒的信用网。同时,还要增强财政科技资金监督检查的统筹性,通过对财政科技资金的科学监

督,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步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项目的阶段性评估机制,促进创新研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向科技应用转化。

第三,建立健全财政贴息、信用担保体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税收减免、绩效奖励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的科研能动性。要鼓励地方财政创新,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基金和科技型企业科创基金,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合格的投资者按市场化方式发起设立各类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应用型投资基金,扩展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环境;建立科技贷款贴息机制,加大财政科技资金对科技企业的补贴力度,降低中小型企业融资成本;健全科技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考虑运用“政府推荐+担保+贷款”“创投+担保+贷款”等模式,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型企业增信难题。同时,还可通过财政贴息和信用担保等间接性财政措施,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资金紧缺问题,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金透明度。

第四,强化税收倾斜政策和政策体系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收倾斜政策能直接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科技成果转化领域,激

发企业自主创新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观能动性。除了实行降低企业所得税这一最为直接的税收优惠外,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包含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合并股权激励征税环节、延长股权激励纳税期限等多方面内容的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同时,税收倾斜政策还应同时将重点放在研发项目上,适当调整税费的抵免和扣除标准,通过多维的税收倾斜政策,激励企业加大在科技创新项目和成果转化上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此外,还要适时完善针对科技成果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实行阶段性成果的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成果转化风险。

还要看到,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亦十分必要。除了财政科技资金的支持,还需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各个环节的活动,更好地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要积极培育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主体,鼓励各个社会投资主体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各环节,通过财政资金和社会风险投资的相互协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以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宋贵伦

实践真知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事关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总结,更是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要看到,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党建是城市党建工作的重要基础。这些年来,社区成为人们居住、生活的主要场所,社区居民的构成以及居民对生活的需求都

日益多元化。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以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如何通过社区发展治理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社区党建在组织建设层面得到了重视,党的组织在社区层面实现全覆盖,全国各地都涌现了不少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北京在全市选择100个小区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试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在社区成立党组织、派党建指导员,着力实现“应建尽建”“应派尽派”;再如,天津河东区在深化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性系统性建设的同时,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切入,探索构建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多方联动机制,有效统筹整合各方力量资源,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总的来看,北京等地积极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取得了不少成绩,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也要看到,其成效还是初步的,还有不少弱项需要加强、不少短板需要补齐。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总结北京等地的实践经验,一手抓顶层设计,一手抓基层基础,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以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加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北京等地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抓住了城市居民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有利于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水平。今后,应进一步把以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升社区党建的服务能力当作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大事,认真抓紧抓实抓好。

其二,坚持党的领导,是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北京等地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抓住了党的建设这个龙头,有利于把我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今后,要积极探索社区党建新路子,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要完善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和体制,通过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保障社区党建和服务的空间、资源,发挥党组织、党